

山西长篇小说 史纲

山西省作协长篇小说专业委员会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山西长篇小说 史纲

山西省作协长篇小说专业委员会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长篇小说史纲 / 杨占平主编. —太原: 北岳
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378-4294-5

I. ①山…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史—山
西省 IV. ①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096号

书 名 山西长篇小说史纲
著 者 杨占平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阎宏睿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5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294-5
定 价 39.80元

目 录

总 论	傅书华 / 001
-----------	-----------

第一章 1940年代之前

第一节 概述	苏春生 / 013
第二节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苏春生 / 019
第三节 高歌的长篇小说创作	苏春生 / 025

第二章 1940—1970年代

第一节 概述	苏春生 / 029
第二节 赵树理的长篇小说	苏春生 / 038
第三节 其他经典之作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杨占平 / 043
马烽的《刘胡兰传》	杨占平 / 050
刘江的《太行风云》	杨占平 / 059

第三章 1980年代

第一节 概述	陈 坪 / 063
第二节 冈夫的《草岚风雨》	杨占平 / 069
第三节 焦祖尧的长篇小说	陈 坪 / 076

第四节	成一的《游戏》《真迹》	杨占平 / 081
第五节	柯云路的《新星》	陈 坪 / 083
第六节	哲夫的长篇黑色生态小说	杨占平 / 088

第四章 1990年代

第一节	概述	孙 钊 / 091
第二节	老作家的新作	
	马烽的《玉龙村纪事》	杨占平 / 095
	高岸的《世界正年轻》	王春林 / 099
	林鹏的《咸阳宫》	王春林 / 105
第三节	艺术追求	
	李锐的《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	杨 鑫 / 114
	蒋韵的长篇小说	侯文宜 / 132
第四节	关注现实	
	张平的《抉择》	孙 钊 / 153
	王东满的《大梦醒来迟》	杨占平 孙 钊 / 165
	孙涛的《龙城三部曲》与《龙族》	孙 钊 / 168
第五节	特色写作	
	钟道新的《特别提款权》	傅书华 / 171
	吕新的写作	杨占平 / 175
第六节	乡村风景	
	王祥夫的《种子》	王春林 / 178
	王西兰的《送葬》	傅书华 / 186
	田澍中的《五汉街》	傅书华 / 190
	彭图的《野狐峪》	杨占平 / 195

第五章 2000年代

第一节 概述 王春林 / 198

第二节 扛鼎之作

成一的《白银谷》《茶道青红》 傅书华 / 207

李锐的《银城故事》《张马丁的第八天》 傅书华 / 223

钟道新的《巅峰对决》 傅书华 / 235

第三节 现实描摹

张平的《十面埋伏》《国家干部》 杨占平 孙 钊 / 241

晋原平的长篇小说 陈 坪 / 242

李骏虎的《母系世家》 王春林 / 247

第四节 多彩生活

刘慈欣的科幻长篇小说 傅书华 / 255

张行健的《古墟苍茫》 王春林 / 260

毛守仁的《北腔》 王春林 / 265

刘维颖的《水旱码头》 王春林 / 271

第五节 女性写作

蒋韵的长篇小说 侯文宜 / 278

张雅茜的长篇小说 侯文宜 / 296

陈亚珍的长篇小说 侯文宜 / 308

葛水平的长篇小说 侯文宜 / 325

后记 杨占平 / 343

总 论

在古代中国，文学的源头是抒情文学，北方的《诗经》与南方的《离骚》这一抒情文学形态与中国自然经济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一抒情文学形态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沛然生机达到了巅峰状态，这就是唐诗的辉煌；又伴随着新的商业经济形态的兴起而走向了新境，这就是宋词的灿烂。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则是与商业经济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兴起、印刷技术的发达以及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相同步而成长起来的，并在明清之际趋于成熟。其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长篇小说的出现。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则为山西太原人而又有游历江浙经验的罗贯中所作，之所以如此，或许是由于其时山西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且商业经济也已经初露端倪，或许是江浙一带商业文明日盛，而罗贯中在那里有着亲身的经历与体验，也或许是这二者的融合造就了罗贯中的这一成就。总之，是历史把这一份殊荣留在了三晋大地，让三晋大地平添一份骄傲。

但凡文学名著，总是凝聚了某一民族的心灵密码、价值结构、社会形态、历史演化等等，《三国演义》自然也不例外。在这部名著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理解，那就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看到了中华民族在以群体伦理为社会价值本

位中所形成的价值结构，那就是对忠与义、力与智的推崇；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人际构成，那就是君臣、父子、朋友、兄弟等等；看到了达于极致过分成熟的人际关系的艺术与智慧，那就是桃园三结义、三请诸葛、三气周瑜、刘备摔孩子、曹操杀杨修等等，以及一系列的“计”：空城计、苦肉计、连环计、反间计、美人计等等。人物形象的鲜明，故事情节的引人，细节的丰富与生动，语言的感染力，都是让这部名著百读不厌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小说艺术的一座高峰，也是山西古代文学长篇小说的历史性硕果。

“五四”时期至1940年代，山西没有出现在中国文学范围内产生大影响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李健吾所写的《心病》、高歌所写的《四十万言情书》。前者虽立意新颖，思想、情感的表达均处于时代前沿，读了让人有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一震之感，但作为长篇小说，其文体形态毕竟不够成熟。后者虽然在情感表达上汪洋恣肆，让读者得以以此看到一代新青年的情感世界、人生形态，但作为叙事艺术，其叙事性过于薄弱。山西的长篇小说在这一时期，就全国范围看，之所以没有大的建树，原因颇值探讨。“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始行白话文体，其突破口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由于缺乏积累，一时不能成功，其因不难明了。但至1930年代，当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等等已经造就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高峰时，山西的长篇小说何以不能同步发展？是因为山西的现代文化风气不够浓郁、现代意识不够强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不够激烈，还是因为山西传统文化形态过于强大，山西生存形态相对稳定？其因至今不明。

1940—1970年代，山西的长篇小说终于在中国的长篇小说格局

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就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作品的出现。中国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段，其占主潮位置的，是工农兵文学思潮。这一思潮兴起、奠基于1940年代，其在创作上的标志性成果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及“赵树理方向”下的一批创作成果，其在理论上的标志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文学思潮的高潮实现于1950年代，标志性成果是作为长篇小说的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等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及马烽、王愿坚等人的短篇小说。其下滑期是1960年代前期，标志性成果是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其消亡期是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标志性成果是八个革命样板戏，是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一思潮的美学原则是，文艺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写英雄、重歌颂、重文艺的教育作用、功利作用；是强调作家的写作立场、写作身份；是从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走向“人民文学”，从对“人”的揭示，走向对社会“本质”、历史“规律”的揭示等等。赵树理的小说因为被指认为符合这一美学原则，因之，曾经一度被奉为“旗帜”与“方向”。就长篇小说而言，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胡正的《汾水长流》等，也因此而倍受殊荣。

但是，山西这一历史阶段文学成就的标志性成果是短篇小说，与山西这一历史阶段的短篇小说相比，山西这一历史阶段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其地位，还是其艺术成就，均远远不及短篇小说。且不说这一历史阶段，山西出现了一大批以写短篇小说著称的作家，如孙谦、李

束为等等，即以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而言，其短篇小说的成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抑或是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也都远远高于其长篇小说的写作。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登记》《锻炼锻炼》。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等等。就山西文学在中国这一文学历史阶段中的位置而言，这一特征就更为明显：工农兵文学思潮兴起的标志性成果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其高潮的标志在山西是马烽等人的短篇小说，其下滑期的标志，在山西是对以写“中间人物”而著称的“山药蛋派”的批判。而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工农兵文学思潮在兴起或者奠基期在长篇小说中的标志性成果，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而不是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这只要看看当时获“斯大林文艺奖”的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而不是赵树理的《变迁》即可了然。工农兵文学思潮高潮期在长篇小说中的标志性成果，柳青《创业史》的位置，是明显地高于赵树理的《三里湾》的。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山西的长篇小说创作成就之所以不及山西的短篇小说创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是山西的短篇小说，从被指认的角度看，比其长篇小说更符合其时的工农兵文学思潮的美学规范；或许是对山西的长篇小说的成就存在着误读，譬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的艺术成就，其实是高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也或许是文学史家的批评尺度存在着问题，譬如，在农民与国家的“紧张”关系中，赵树理的作品是站在农民一方，而文学史家们的尺度则站在国家一方；还或许是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的错位使之然，譬如，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美学价值要高于

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但其历史价值却远远不及后者。山西的文化形态、文化特征也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应该给以考虑的一个角度：山西文化偏重立足于眼前的生存实际，短篇小说可以快捷地反映现实，而长篇小说则需要有一个大的长远的历史眼光、历史视野，这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80年代，山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仍然不及山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如其时郑义的《老井》《远村》、李锐的《厚土》、张石山的“家族系列小说”、成一的“心态小说”等等，风起云涌，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山西其时的长篇小说所不及的。其原因除了我们上面所猜测的以外，与其时全国的中短篇小说的成就普遍地高于长篇小说成就也不无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际，长篇小说的普遍成熟，还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

但这一时期，山西的长篇小说创作也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其中主要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焦祖尧的《跋涉者》、成一的《游戏》、冈夫的《草岚风雨》、哲夫的《黑雪》《毒吻》《天猎》等大生态小说等等。

1980年代，被称之为“新启蒙时代”，其时代标志是意欲重新“回到五四起跑线”、重新回到“人的文学”，并将中国纳入新的“现代性”进程。因之，这一阶段，中国文学有两个发展向度：一个向度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对当时社会形态、社会问题的审视之中，并将对人的审视置入其中。这与其时中国刚刚从一个政治时代走出来，中国社会、中国民众还更多地受着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在政治文化的形态下，要求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要求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要求着“人”的解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另一个向度是从“人性”

“人”的“存在”角度切入对社会对人的关注，并因而进一步借助西方的现代主义的文学手法，这与其时试图直接回到五四时代“人的文学”并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试图从西方汲取新的价值资源的时代大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柯云路、焦祖尧的长篇小说，是上述第一个向度在山西的代表。《新星》将当时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改革及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当时人们所能够目及的领域内，如干部的品德问题、经济管理的方式问题等等，做了突出的揭示，其主人公李向南的“清官”形象，其与女主人公的情感关系，均因切合当时民众在中国社会改革中对“清官”、对“人性”的需求，从而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其后的《夜与昼》虽然在人性的揭示上，更为深入，但却因为离当时民众的阅读需求有了一定的距离，反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成一的长篇小说，是上述第二个向度在山西的代表。成一在1980年代，以“心态小说”而名噪一时。其“心态小说”是对“人性”“人的存在”的深层揭示。其《游戏》是从“心态小说”发展而来，是其“心态小说”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只是在《游戏》中，为了深化这种揭示，必然地借助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值得重视的是，成一的这种借助，不是在形式层面上的，不是西方现代主义名作的“副本效应”，而是将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视为是对人的存在形态的呈现方式，并将这种呈现方式，用于对中国人存在形态的呈现之中。

相较于柯云路、焦祖尧、成一在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冈夫、哲夫的长篇小说创作，则因于其时的文学主潮有着一定的距离，因而未能受到充分的重视。冈夫的《草岚风雨》以朴素的写实手法，

以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六十一人集团”的史实为依据，再现了那一代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斗争经历。这部小说，不仅有着一定的文学价值，也有着相当的史料价值，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文史兼具的作品，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当许多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失去其光彩后，这一文史兼具的作品，却以其真实性而将一再地被人所阅读。哲夫的小说，集中于对生态环境的描写。生态环境，在1980年代，还没有受到社会及公众的高度重视，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一问题将越来越不能回避地呈现在社会及公众的面前。哲夫的长篇小说，在这方面，是有着一定的超前性的。但也由于冈夫与哲夫，没有有效地将其时文学主潮所提供的新的文学资源，汲取、化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影响了他的作品迈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1990年代，无论就全国的小说创作来说，还是就山西的小说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在1980年代曾经雄居中国文坛中心的中短篇小说风光不再，其他的文学文体也没有呈现强劲的势头，唯独长篇小说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堪称一流的作品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这或许是因为1990年代是一个商业经济全面形成的时代，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在社会的转型期，对过去了的时代的回顾、总结，成了一个时代的普遍的精神、情感需求；这或许是因为在经过了1980年代的各种各样的文学试验文学努力之后，作家们积累了相对成熟的创作经验，从而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创作能力上做了充分的准备；这还可能是因为伴随着商业经济大潮的涌动，公众精神生活的分流，文学期刊销路不畅，因而影响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从而使作家把创作的重点转向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总之，1990年

代长篇小说何以出现高潮，其原因说法不一，但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形态，却是不予争论的事实。山西也同样是如此，长篇小说成为能够体现山西文学创作成就的主要的文学文体，山西并在这一历史时段，举办了“恒泰杯”长篇小说大赛，参赛作品众多，获奖作品中也颇多优秀之作，单单这一大赛本身，或许也就可以说明长篇小说创作在山西的气势与阵容了。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山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在1990年代之前，一直不是山西文学创作的主力，但在1990年代，却同全国文坛发展趋势一致，成为山西文坛的主要文体。

这一历史时段，能够体现山西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主要作品是：张平的《抉择》、李锐的《旧址》、成一的《真迹》、蒋韵的《栎树的囚徒》、钟道新的《特别提款权》，以及吕新的《抚摸》、马烽的《玉龙村纪事》、李国涛的《世界正年轻》、林鹏的《咸阳宫》、孙涛的《龙族》、晋原平的《生死门》、田澍中的《五汉街》、王西兰的《送葬》等等。虽然学界公认说1990年代是一个“无名”时代，是一个多样化时代，不易从价值指向上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做高度的概括与归类，但就山西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我们还是大致可以将其归为两大类：一大类是近距离关注社会现实的小说，一大类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相纠结的小说。

张平的《抉择》属于第一大类的小说，且在这一历史时段，是山西文学创作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980年代，山西文学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载体，涌现出了一个以成一、李锐、张石山等为代表的被称之为“晋军”的创作群体，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自1990年代之后，这一“晋军”集中的创作高峰成为过去，山西文学界遂以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茅盾文学奖为契

机，提出了自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成一、李锐等为代表的“晋军”之后，山西第三次文学创作高潮正在形成的概念，而张平的《抉择》则是这一创作高潮的显著标志。张平的这部小说，近距离地直面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通过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体现社会公众的理想，并且强调情节的可读性，以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这样的一种文学形态，与山西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及“晋军”中以柯云路为代表的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对当下社会形态、社会问题的审视的创作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与山西的区域文化形态、特征，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因此，成为1990年代，面对新的经济、社会形态而形成的新的多元化的文学形态中的重要一支。山西文学界所倡导的这一文学形态，是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原因、历史渊源的。这一大类的作品在山西数量颇多，且不乏优秀之作，如孙涛的《龙族》、晋原平的《生死门》等等。

可以归入第二大类的长篇小说较多，且各自的表现形态、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李锐的《旧址》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锐在1980年代，以短篇小说的形式，以他在山西农村的插队生涯为写作资源，以山西农民的生存形态为载体，揭示“人”的生存、存在形态。但《旧址》则体现了李锐的另一个写作向度的创作追求，即以其祖籍四川自贡的家族为写作资源，通过对现代历史的叙写，揭示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的“紧张”关系，揭示个体生命怎样在社会、历史“神圣”的名义下，被吞噬的悲剧性命运。这样的一种写作指向创作形态，在蒋韵的《栌树的囚徒》中，也有着深刻的别一风貌的体现。

成一的《真迹》也体现了他创作上的大幅度转向。成一在这之前

的创作，一直以对人的心灵密码、命运密码的执着解读为重点，且坚持其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不追求可读性，可改编性。但这部长篇，从内容上说，放弃上述执着而重点在于对事物真相的“解构”与“消解”，隐喻着作者对一种认识、把握世界、人生本质方式的理解；从表现形式说，这一理解的沉重与繁复，又潜隐于一种通俗的表现形式之中，使作品具有了较强的可读性。

钟道新的长篇小说，如同他的中短篇小说一样，擅长写高智商的知识分子，通过丰富的知识信息量，写在丰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优雅的生活、智力的优越等等，从而在以侧重写底层生活的山西的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

马烽、李国涛、林鹏属于一代人，且均在老年期，在回顾、总结自己一生中，以自己一生的经验，著有长篇新作。比较三人的这些新作，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生形态、思想形态。马烽的《玉龙村纪事》仍然是以阶级斗争的视角，写土改时期的农村生活，但较之其青年、中年时代，对农村生活的叙写，却又颇多超越。将这部小说，与马烽同时期发表的叙写建国初期的回忆录对照着看，我们可以看到马烽这一代作家的思想的丰富性。虽然在反思历史时，马烽小说的批判力度不及胡正的尖锐与深刻，但其作为一代人思想形态的代表性，却是胡正所不可相比的。李国涛原本以写文艺批评为主，但步入老年后，却以长篇小说让众人耳目一新。他的《世界正年轻》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写作资源，让我们看到了脱胎于民国文化而走进共和国文化的一代读书人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林鹏是“小八路”出身，作为正宗的革命者，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后，对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及在这其中的社会变革，颇多尖锐的批判与反思。这些，

在《咸阳宫》中，借古喻今，有所体现。这三部小说，虽然在文学性上，可能在山西长篇小说中，影响不是太大，但作为研究那一代人的精神产品，却有着其不可估量的作用。

田澍中的《五汉街》、王西兰的《送葬》，前者写出了乡村百年的沧桑，并突出地体现了山西本土作家的优势与局限，理性弱，感性强，情节理念化，细节生活化，忠实于生活而又符合于某种观念。后者受王汶石以抒情笔调写乡村人心人情的影响，以强烈、浓郁的人性人情，写出了一曲催人泪下的乡村悲歌，其抒情性特色，在沉实厚重的山西文坛中，颇为醒目。两部作品虽然还不能称之为大作品，但却以其独特的代表性，而不能被忽视。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提出了“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试图以此来概括、把握新世纪文学的新的形态、特征。这些新的形态、特征是什么，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这一时期，中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势头呈进一步高涨之势，山西的长篇小说创作也是如此。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成一的《白银谷》《茶道青红》，李锐的《银城故事》《张马丁的第八天》，张平的《国家干部》，蒋韵的《隐秘盛开》，李骏虎的《母系氏家》，葛水平的《裸地》，陈亚珍的《羊哭了 猪笑了 蚂蚁病了》，以及焦祖尧的《飞狐》，钟道新、钟小骏的《巅峰对决》，张不代的《草莽》，晋原平的《权力门》，毛守仁的《天穿》与《北腔》，刘维颖的《水旱码头》与《血色码头》，韩思中的《死去活来》，张行健的《古原苍茫》，张雅茜的《此生只为你》等。

这一时期山西的长篇小说创作，较之1990年代，其长篇小说的形态更为成熟，其标志是“史诗”品格的成熟。具体来说，可以体现在